

誠信與謊言——

商業倫理如何帶出追尋真理

Stephan Rothlin 著

梁柱新譯

近年來世界各地的商業醜聞層出不窮，我們已經知道的有安隆/安德信(Enron/Andersen)、世通公司(WorldCom)、環球電訊(Global Crossing)等等。大家可看到一個驚人的謊言網絡，例如「創意會計」(Creative Accounting)被用作騙人的詭計，來隱藏着龐大的負債，不列入資產負債表的交易被管理層用來隱瞞秘密生意來往，以免受到審查。另外有一些著名銀行的研究部門進行推銷瀕臨破產公司的高價股票，這種不當行為是受到廣泛批評的。

連串醜聞並非局限在美國，雖然戲劇化倒閉的公司如安隆(Enron)發生在美國，但在其他國家也有一些公司出事，而這些公司是曾被譽為最負創意和急速發展的。因此，便動搖了公眾對財務機構的信心，更給陰謀論者堅持所謂的大商業機構的本質是不停和無止境的欺詐，休想它們改變過來。

商業倫理的理論基礎

商業倫理的學術研究始於三十多年前的美國的工商管理學院，因為當時某些公司濫用權力，要員工在不安全和不健康的環境下工作。商業倫理的發展從實用科學開始，目的是幫助業內人士、工商界從業員、政府官員作出妥善決策，分辨對錯原則。倫理分析的起點是嘗試研究和了解個案的內容，但在不同情況下，我們時常相信對某一個案

的內情已有基本認識，因而不再作澈底調查。大眾傳媒包括互聯網、報紙、電視網絡等帶來高透明度的新文化，對倫理的追求是絕對有幫助的。

那麼，要隱藏醜聞就不可能了。另一例子是前智利官員的「望德新羅-錄影帶」(Montesinos-Videos) 使公眾震驚，因為它錄影了廣為人知的公眾人物接受賄賂的過程。大約三年前在中國出現了「新媒體」(New Media)：新聞工作者以查根問底的專業方法調查敏感題材，如貪污、會計作弊、和不安全工作環境等等。另一主要元素是「消費者運動」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此運動開始在中國萌芽，但在香港和澳門已經發展得很好，消費者有一把強大聲音，申訴騙徒的劣行。消費者運動組織出版的刊物給商業機構有效和健康的壓力，而令其遵守承諾。近期「市場倫理」(Marketing Ethics) 引起極大關注，特別令人注意到一些虛假廣告，例如欣欣向榮的地產市場從業員以明顯的謊言來引誘潛在的買家入貨。

煙幕之母

在芸芸卑鄙欺詐行爲中，有一種獨特謊言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公司的總裁在法庭作供，宣稱他沒有察覺公司內有不法行爲。例如：安隆的創辦人堅尼夫·李(Kenneth Lay) 堅持沒有察覺到他的下屬進行過不入資產負責表的交易。雖然不易證明李先生(Mr. Lay) 已察覺到這些令人懷疑的交易，但主審法官仍要李先生和它的繼任人謝菲·史喬零(Jeffrey Skilling) 爲安隆的戲劇性倒閉負責。因此，所有受安隆事件影响的人，包括股東和所有受益人在內，他們可以制止公司倒閉前的管理人員拿到豐厚的補償後逃走，這就是所謂的「金降落傘」(Golden Parachutes)。另一種欺騙例子是：公司的高級經理叫僱員們不要出售

所持的公司股票，但這些高級經理們卻在公司倒閉前賣出所有股票，賺取巨利，所以這些僱員們便受欺騙了。

煙幕之母的形成基於一個信念：公司的領導人應該為僱員、股東和受益人的最佳利益行事，但這是天真的幻想，明確的事實是公司領導層只按其貪婪本性行事，對整間公司絕無責任感。

犬儒們趨於把這些論據放在一邊，聲言沒法消除謊言，因為身居領導地位者普遍都是貪婪和有能力制止受害人知道真相，使他們可永遠濫用權力。新資訊科技的出現深遠地改變了這一切，與公司利益有關連的人明顯地更易接觸公司，獲得比以前更多與公司有關的資料，其中包括敏感資料，這樣他們以有備而來的姿態提出所關注的問題和批評。

歷史醒覺

歷史是一個難以處理的主要領域，因它混合了半真半假的事情和謊言，很多意識形態上的偏見會干擾和損害客觀看往事的立場。從這個觀點來敏銳地思考倫理是可以達至歷史醒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府似乎拒絕承認他們在不同領域侵犯人權的責任和罪咎，例如集體大屠殺(只想提及強佔南京時三十多萬中國人被屠殺)，虐待女性的「慰安婦」及各種戰爭罪行，更一而再地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為這些罪行辯護。「慰安婦」一詞便是粉飾粗暴佔有和虐待婦女，利用她們作性奴，又使她們看來好像是在參與一種平常和自然的儀式，但其目的是為滿足日本皇軍的性需要。從九十年代開始，來自韓國、中國、和台灣的「慰安婦」組織了一個重要的運動，嘗試控告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隊所犯的罪行。直到一九九五年日本社民黨的首相宮澤喜一(Miyazawa)才第一次為所有戰時罪行道歉，但是受了一小群右翼人士

所影响，日本近代史教科書仍然隱瞞皇軍的罪行，這仍然是全亞洲和全世界的醜聞。

類似的否認不只發生在一個國家，一系列南美國家例如瓜地馬拉、厄瓜多爾和智利成立了「真理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來澈底調查前革命委員會所犯的大屠殺和嚴重濫權罪行，這可算是一項重大成就。

另一個遲來的痛苦歷史醒覺例子發生在瑞士，有關希特拉在瑞士恐怖統治的興起到未落。瑞士歷史學家博之亞 (Bergier) 完成了「博之亞報告」(Bergier Report)，澈底調查瑞士政府和瑞士銀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應負的責任，使人們對瑞士人與罪惡統治者合作有更適當的了解，因而迫使瑞士銀行收緊其經營規律，他們要審查其(罪犯)客戶和重訂保密規則。

在商業領域裏，公司醜聞引起公眾嘩然，並感到無限的挫折和憤怒，因此導致美國的沙比士-奧士李(Sarbanes-Oxley) (SOX)) 法例於二〇〇二年實施，要上市公司發出可靠和証明正確的資產負責表。不少強大聲音認為 SOX 肯定是反應過火，使中小型公司受不了法律和財務上的負擔。

誠實的量度和「保證」

單靠一條法例來解決所有這些複雜問題，算是天真想法，歹徒永遠會找到逃避法例的途徑，然而法律的底線只是描述懲罰，對一些只懂嚴刑峻法的人來說，SOX 給了全個商界一個強而有力和必須的警號。去年前鐵高公司(Tyco)總裁單尼斯·確斯魯斯基(Dennis Koslowski)和世通公司(WorldCom)總裁賓納·厄伯斯(Bernard Ebbers) 被判入獄

二十五年，保證了公司所有受益人的冤情受到重視。鐵高公司(Tyco)的危機激起了公司結構上的戲劇性改變，更換了全部董事，堅決承諾依倫理規則辦事，這樣公司才得免於破產。

公司管治方法主要是把董事局和管理層分開，管理層真正要負全責，如有需要，董事局可以趕走總裁。管理層要經常用財政報告證明公司管理有方、可靠和值得信賴。

「誠信」和「謊言」永遠不能準確地量度出來，然而量度方法是必需的，因此以貪污——一個謊言昭彰的領域——來建立量度方法。一個名叫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機構(基地在德國柏林)，每年印行一個基於廣泛標準的「貪污指數」，由貪污最少的國家：通常是北歐國家列表首，至排末尾貪污最猖獗的國家，非洲仍是可悲的冠軍。然而到現在這個「貪污指數」仍未能包括其中一種最醜惡的貪污行爲，多發生於發展中國家的學術界：教授和學生作弊，違反知識產權，却都不會受到懲罰，因為他們與其上司關係良好。

近期爲公司催生倫理規律的行動很易變質，成爲粉飾門面的推銷工具，爲使這些規律配合公司的運作和形像，互相監督的平衡力量決不可少，公司一定要看重每個不同角色。玩具公司麥塔(Mattel)是一個好典範，它在四十多個國家一直成功經營，當在一九九八年受到抨擊在剝削勞工、工作環境惡劣、工資低時，董事局決定成立獨立委員會，監督各工廠切實執行其生產原則。在四年後的二〇〇二年委員會總結，認爲麥塔(Mattel)在中國的大部份工廠(只有個別例外)都大大地提升了生產規格。

培育誠信

假如商業倫理是學術上的一種方法，用來尋求真理時，除了上文

所提的法律行動外，它一定還要有培育求真精神的功能。企業家坦白承認當在工作上遇到強大不道德力量和其他壓力時，他們便很易放棄作倫理考慮。顯而易見，一個單獨個體很難成為倫理英雄，所以在「德行倫理學」的範疇內，商業倫理在尋找能激勵人心的人和機構作為模範，因他們雖面對障礙和困難，仍堅持以德為本行事。一間名叫偉指(Wei Zhi)的中國西安公司是一個具說服力的例子，成立於一九八七年，經營服裝生意，現在已拓展到其他行業，始創人上了頭條新聞，因他以孔子倫理作為選用僱員的指導原則，更是首先實施退換和賠償次貨的政策。

總括來說，達至誠信仍有一段長路要走，無人可以肯定貪污和說謊網絡真的會日漸減少。不過商業倫理是理智的嚴密思考出來的，所以要用各種方法來尋找真理就成為公司、政府和其他機構所渴望的目標。